

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思想解析

——以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分析为路径

符海平, 刘向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罗定 527200)

摘要: 斯皮瓦克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浪潮中的代表人物。她关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 主张不能因为民族、性别、肤色等因素而放弃文化批评的权力, 并通过策略性本质主义的批评策略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的分析, 揭示了白人女性主义者的特权意识和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霸权本质, 实现了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再认识。斯皮瓦克的批评思想和方式为我们研究西方或白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与新方法。

关键词: 斯皮瓦克; 策略性本质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 第三世界女性; 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2)04-0102-04

Aanalysis on Spivak's Thought of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

—— Taking Spivak's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as the Approach

FU Hai-ping, LIU Xiang-hui

(Luoding Polytechnical College, Guangdong Luoding 5272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brilliant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 Sh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therness who was marginaliz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rule, claiming that she can't give up the power of the cultural criticism because of factors of the nationality, gender, skin color and so on, and overturn the gender, cultural, and racial level order through the weapon of strategic Essentialism. The author mainly uses Spivak's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as the approach to clear up her thought of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 reveal the privilege consciousness of the white feminist and the hegemony nature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t power discourse, and realize the recognition and rediscovery on the differences of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Key words: Spivak; strategic essentialism; postcolonial feminist;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power discourse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它关注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 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 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神圣三剑客”之一的斯皮瓦克, 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浪潮中的卓越代表人物。她主张文化批评的权力是人自身所具有的, 不能因民族、性别、肤色等因素的不同而予以放弃, 不然, 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声音。在斯皮瓦克卷帙浩繁的理论中, 她对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和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本文主要从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分析这一视角进行论述, 对其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思想细化梳理, 以昭示当代帝国主义话语方式的霸权本质, 实现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再认识和再发现。

一、以策略性本质主义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评策略

策略性本质主义是斯皮瓦克在承袭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批评策略。它主张将解构主义作为方法策略性地应用于女性主义理论, 既能表现他者, 又能表现自我, 以此反对一些人攻击她代表身不在其中的属下群体发言。此理论中的本质具有过程性和手段的功能意义, 既是反抗的对象又是反抗的武器。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有效批评策略。斯皮瓦克继承德里达“书写”、“延异”、“踪迹”、“抹擦”等核心概念, 并赋予它们以巨大的张力, 实现了解构思维的策略性应用。她把“书写”概念建基于人类意识的能动性之上, 赋予其文本概念以更为灵活和广泛的所指, 以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对他者世界的世界化过程及殖民话语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工具性角色。策略性本质主义

收稿日期: 2011-11-30

作者简介: 符海平(1982—), 男, 江西永丰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伦理学研究; 刘向辉(1980—), 女, 湖南邵阳人, 助教,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既否定了那种忽略女性内部差异的本质主义,又否定了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的反本质主义。如斯皮瓦克本人所说:“解构告诉我们,反本质主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本质主义存在于知识、行为以及存在的产生条件之中,但本质主义却没有给我们一条走向现实真相的线索。真相在解构中既不是本质主义的,也不是反本质主义的。它引导我们要用一种反直观的方式去思考本质的存在与否。”^[1]策略性本质主义以类似于“以暴制暴”的方式颠倒了传统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以动态的、不断差异和推延的模式代替了静态的、稳定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仍赋予传统形而上学稳定概念系统以暂时性、情景化的重要意义。此外,策略性还体现出了一种平衡性。斯皮瓦克赋予这种本质主义反抗功能的临时性,通过“抹擦”来防止形成新的压制力量,以避免弱势一方取得新的霸权。正是赋予稳定概念系统以临时性,所有的语言、表达、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才能获得依托,解构的策略才具备理论的力量,后殖民文化反抗最终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这种斯皮瓦克式的批评策略一方面有效地保留了解构的摧毁性特征,以应对语音中心主义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解构本身所蕴涵的建设性力量,以适应后殖民文化批评实践。

二、属下女性主体性差异性之再现

策略性本质主义批评策略是由斯皮瓦克首次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巨大的理论张力首先体现在讨论底层研究小组所探寻的属下主体意识,尤其是属下女性之主体意识。由于底层研究小组没有认识到解构的策略性,由此导致他们的话语移植工作忽略属下阶层的内部差异,对属下斗争历史中的具体情况缺乏充分的认识和阐述。在斯皮瓦克看来,他们重蹈了自发性与意识或解构与历史之间争论的覆辙。“底层研究小组提供的关于话语转移的全部叙述也是关于失败的叙述。”^{[2]138}以古哈为代表的底层研究小组成员通过把苏维埃与巴特的符号学分析结合起来而根本改变了殖民地印度的历史编撰,由此揭露了无厉害关系的历史编撰的话语性。“历史的缪斯和反叛逆性证明是共谋的。”^{[2]139}因此,他们文本中的因素导致一种解读,“即把追溯底层人意识的计划当作大量历史编撰中的替代性叙事来解剖,并把主体效果定位为底层。”^{[2]144}底层人研究小组把这种新生的集体底层意识的理论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股倾向中,甚至放在了帝国主义的舞台上,从而拒绝承认前资本主义的底层阶级具有阶级性。在斯皮瓦克看来,在历史上试图把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强加在殖民地环境中的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底层阶级头上,从而在对峙中取代了底层阶级,这种做法是极其不合理的。

在妇女问题上,小组忽略了妇女这个概念——

隐喻对于其话语的功能的重要性。在一种特定的阅读中,妇女人物在话语系统功能的转换方面完全是一种工具性的(如在动员叛逆中)。然而,小组很少提及这种工具性的机械方面。“在最‘古老和本土’的宗教层面,‘在集体困苦和外来压迫的时候或许给[叛逆的山里人]以额外力量’的一个层面,诸神变成了吃人的女神。当叛逆前的集体准备开始叛逆时,他们继续向女神而非神献祭。而且,甚至当这个底层人叛逆的层面与‘早期的中坚斗争’形成对比时,我们注意到在那个早期阶段斗争是在两种环境中进行的,因为男人不会接受女性的领导。”^{[2]152-153}斯皮瓦克认为,在社会符号学上,女性一方面是吃人的女神、崇拜的对象和团结的缔造者,另一方面是不能接受为领导的世俗的女儿们和寡妇们。在这里,具有重要工具性功能的妇女的主体性,被小组完全忽略了,成为完全的缺场。此外,在《底层人研究》中的区域性的概念和权力的社区模式中,女性主体被简单地排除了。妇女是底层或叛逆符号学中被忽视的结构体。尽管没有正当身份的妇女维持了这个血缘的或神话的父系家族,但是妇女主体性却在这种动员和团结中被剥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中,社会集团几乎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她们始终处在无声的角落,成为“边缘化的他者”。对此,斯皮瓦克认为,底层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必须把妇女作为结构的问题提出来,而不是仅仅处在某一文化形态或文化的边缘问题。总之,在斯皮瓦克看来,在关于区域和权力的社区模式等相异的例子中,妇女这个人物,从氏族到氏族、从家庭到家庭,女儿/姐妹和妻子/母亲的角色,保证了父权社会的延续,即便她自己丧失了正常的身份。在这个特殊的领域里,社区或历史的连续对底层人女性来说,是通过掩盖她自身的非连续性,通过不断抽空她作为工具的意义而生产出来的。底层女性主体性的异质性是研究主体与客体——底层人研究小组与底层人——之间的共谋。

斯皮瓦克通过解构主义的解构策略赋予属下概念情景化和灵活性,从批评的视角揭示既有的话语方式在再现过程中的普遍化和这种普遍化可能造成的压制,从而把那些具有普遍化倾向的概念可能掩盖的差异性揭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持续打断那些压制符号链条的过程中,那曾经消失的他者对象才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获得了倾听属下声音,尤其是属下女性的可能性。正是借助解构的力量,斯皮瓦克克服了属下研究小组只考虑男性属下主体的局限性,给我们再现了属下女性在社会历史中、民族独立前后的生活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实现了对属下女性的再认识。

三、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之总体化倾向

对西方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之总体化倾

向的批评,是斯皮瓦克关于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的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斯皮瓦克看来,第三世界是一个处于西方话语中心“边缘地带”的“他者”,在西方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和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西方白人的“帝国情绪”,存在着严重的殖民化倾向。白人女性主义者和白人父亲达成了同谋。在斯皮瓦克看来,“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问题是,它认同于与美国种族制度相应而生的种族主义。因此,今天我们要发掘的不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或真凭实据,而且还要探讨,殖民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怎样借助伟大的欧洲理论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常常是有文学实现的。长期以来,美国女性主义者将‘历史’视为一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其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3]310}

斯皮瓦克认为,尽管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发展和解放作了重要贡献,但是它忽视了那种由于阶级、种族、地区、文化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女性的差异性,把自己的观点作为了普遍化理论。白人女性主义者在其理论中处处展现了其特权意识、文化优越感及主观臆断性。如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性主义》中,斯皮瓦克批评了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多娃所彰显的文化优越感和主观臆断性。在斯皮瓦克看来,克里斯多娃在《关于中国妇女》一文中,宁愿选择模糊的过去而不喜欢现在,她对现在大部分的论述是日期、法规、重要人物和重要地点,关于过去和现在这两点论述之间没有什么过渡转折。“在反映广博的西方文化实践的同时,对‘古代’东方采取的是尚古主义的研究,对‘当代’东方则是以轻蔑现实政治的态度对待的。”^{[3]83} 克里斯多娃在不收集第一手研究资料,只凭借文选译本和别人论文里关于名女人的生命,根据弗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结论,没有分析中国妇女的经历便臆断性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在家庭之外通过各种升华的形式找到一条发泄性能量的渠道,如果中国传统不受到干扰,中国会不加拘谨和充满盲目崇拜地去接近它,会更甚于基督的西方去追求性自由。斯皮瓦克认为,在中国的环境里,克里斯多娃削弱了她对文学作品研究方法的优点,她以古代中国的母亲为中心,从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小册子和一部清朝小说(《红楼梦》),在未作文本分析和翻译的前提下,仓促地作出许多臆断性的结论,克里斯多娃“带有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症状”。^[4]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斯皮瓦克揭露了白人女性主义理论所体现的“白人唯我论”和“种族中心论”,揭示了白人女性主义理论忽略女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差异而一味追求性别身份的普遍性,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状况扩展成妇女的整体状况,以偏概全,以本质的东西取代实际存在的差

异。换句话说,斯皮瓦克为我们揭示出了被掩盖了的作为判断主体的白人女性主义的特权地位。她关于白人女性主义理论总体化倾向的批评,是一种处于西方的第三世界批评对自己所作的策略性的本质描述。她反映了一些身处西方社会中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环境中的主要霸权话语形式的认识,也反映了她们为对抗这种霸权意识而为自己设定的共同斗争的主体位置。

四、第三世界妇女他者化之再现

“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再现产品中,文学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这两个明显的‘事实’在以往的19世纪英语文学的阅读中一直被遗忘了。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5]158} 的确,在很长时间内,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是白人女性,而男性后殖民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境遇始终处于理论视野之外。正基于此,斯皮瓦克通过批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实现了对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妇女之再现。通过对《简爱》、《藻海无边》、《弗兰肯斯坦》三本著名女性小说进行解读,斯皮瓦克深刻地揭露了文本叙事中所流露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了小说文本对第三世界女性所作的“他者”化塑造,揭示了文本与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同谋以及文本在帝国主义征服第三世界并使其殖民化过程中的先导作用。

斯皮瓦克以一种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批评方式对《简爱》进行了后殖民解读。在文学界,《简爱》被称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本。尽管夏洛蒂·勃朗特在文中树立了一位有着强烈个性、敢于追求自我、独立自主的崇高女权主义形象,但是在斯皮瓦克看来,“不仅在英国的文学研究中,而且在对那个伟大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给文学史创造出一种叙述方式,那就是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那种‘世界化’的方式。第三世界被看作一种遥远的文化,既是被剥削的对象,又拥有着需要发现和阐释的丰富完整的文化;……这一切使得‘第三世界’成了一个能指,使我们忘记那种‘世界化’。”^{[5]158} 的确,在《简爱》中,勃朗特对简和疯女人梅森两个女性人物的刻画中,对简无疑是极力褒扬,而对梅森却一味地进行“他者化”建构,把她塑造为一个人兽难分的只会爬行、嘶叫、抓扯的“疯女人”。斯皮瓦克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梅森,是因为她是印度牙买加人,是来自帝国统治下的第三世界。这彰显了西方白人文明和第三世界的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种族偏见。正是这种活跃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小说提供了叙事动力,为简从反家庭的地位走

向合法家庭的地位提供了话语场。

通过对《藻海无边》这一女性主义文本的分析,斯皮瓦克认为,文本的作者里斯暗示了:“即使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隐秘的事情,也可能由帝国主义政治来决定。”^{[5]167}此外,小说文本建构了许多镜像,同时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梦来加强这种镜像。通过将自我演化成那个假想的他者,并放火烧死自己来造就简这一女权主义个体主义的英雄。在斯皮瓦克看来,这一点须读作为帝国一般知识暴力的寓言,读作为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设置的殖民地主体的自我祭献的构想。里斯看到了来自殖民地的妇女,并不是姐妹同盟的愚蠢的牺牲品。“在里斯对这些分为男女主人公的主题重写过程中,女权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共谋的。”^{[5]168}

在对《弗兰肯斯坦》这一女性主义文本的分析时,斯皮瓦克把论述的焦点置于英国文化的身份问题上。斯皮瓦克认为,《弗兰肯斯坦》流露出了不少帝国主义情感,帝国主义话语通过一种异常强有力的方式浮现在雪莱小说中。“试图将‘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一个能者的想法提醒我们,文学的霸权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历史。”^{[5]172}由于帝国主义已经牢牢掌握了殖民地主体构成,文学批评家必须转向帝国主义的统治档案才能找到帝国主义有预谋的知识暴力的意识形态的线索。《弗兰肯斯坦》并不是性繁衍和社会主体生产所表现的那种男性和女性主义的战场。在这里,“种族主义的语言——被理解为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的黑暗面——与男性中心主义的歇斯底里结合起来,成了一种性繁衍而非主体构成的习语,男性和女性的个体作用就这样被颠倒和置换了。”^{[5]174}在这一部作品中,有一个框架式的妇女:她既不是切线,也没有被圈住,更没有圈别人;她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但她是小说得以进行的机会,是一个女性个体主义者。总之,在斯皮瓦克看来,“任何批评帝国主义的方法都不可能将他者转化为自我,因为帝国主义的事业早已历史地把可能成为绝对他者的事物折射为归顺,并巩固帝国主义的自我。”如果批评家想重新打开帝国主义的知识断裂,同时又不致引起对失落的本原的伤怀,就必须转向帝国主义统治的档案。只有试图通过谨慎的档案的阅读,才能跨出欧洲小说传统的极限。

斯皮瓦克通过应用策略性本质主义批评策略再现了第三世界妇女的“他者化”。在这里,德里达的理论为她提供了两个策略高明的方法。一方面是违反意愿或者与表面上的逻辑相悖地阅读文本。“斯皮瓦克强调的这种‘语词误用’(catchresis)法表现在她‘寓言般’地阅读了伯莎这个人物,使她成为殖民地妇女的代表。”^[6]另一方面是斯皮瓦克效仿德里达采用了明显被作为边缘的素材。伯莎是勃朗特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而在《弗兰肯斯坦》中却几乎未提及大英帝国。正如吉尔伯特所说:“其目的是说明各种叙事体的作品,不管是虚构的,亦或政治的、经济的(一如帝国的本身)都是

靠压制、使边缘化、争得机遇、观点及资料来建构自己。”^[6]正是以此目的为出发点,斯皮瓦克在对第三世界妇女“他者化”的分析过程中发展了一种能够对历史上沉默的被殖民者主体说话的阅读策略,通过展现受双重压迫的被殖民者妇女的实例,深刻揭示了被殖民者父权制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本质。

五、结语

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不同的政治空间中通过深化民主观念把反帝反殖的斗争与对抗其他形式的压迫和非正义联系起来,为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发了民主这个具有总体意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它能够把民主思考突破以往的国家社会框架,从一种特殊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即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去思考民主这一概念的解放价值。斯皮瓦克的这种批评角度和视野也使“殖民”这个概念内涵丰富,它已经不再是指那些历史上遭受西方压迫统治、后因取得独立而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民族和人们,被殖民已成为一种描述被压迫经验的普遍范畴,它包括所有非西方的人民。斯皮瓦克为我们开辟了研究第三世界、殖民地和西方文学的广阔天地,为我们讨论西方或白人文学形式提供了一种方法。她的批评方式创造了具有现实改革意义的理论和实践,它不仅有助于规范新的政治理念和策略,而且促成了一种新的具有批判和对抗意识的群体。一切关心人的解放的人们,不论是身处第一世界或者第三世界,都可以同时参与相互有联系的现实世界的种种生存抗争。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的分析,经过自己的带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的经验和创造性转化,发展成为一种居于第一世界之内部的“他者”话语,从而对帝国主义权威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和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解构事业的延续,一种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和白人资产阶级文本书写的解构阅读和增补过程。因此,它既是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殖民控制历史的后遗症进行的一种解读,同时也是第三世界解放事业的继续。

【参考文献】

- [1] 李志应. 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2008:64.
- [2] 斯皮瓦克. 从解构到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4.
- [5]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6] 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M]. 杨乃乔,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2.